

社會與思想叢書



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

詹明信批評理論文選

張旭東 編

ISBN 0-19-586482-4



9 780195 864823

牛津大學出版社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晚期資本主義的
文化 邏 輯

詹明信批評理論文選

張旭東 編

牛津大學出版社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New York
Athens Auckland Bangkok Bogota Bombay
Buenos Aires Calcutta Cape Town Dar es Salaam
Delhi Florence Hong Kong Istanbul Karachi
Kuala Lumpur Madras Madrid Melbourne
Mexico City Nairobi Paris Singapore
Taipei Tokyo Toronto

and associated companies in
Berlin Ibadan
Oxford is a trade mark of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irst published 1996
This impression (Lowest digit)
1 3 5 7 9 8 6 4 2

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

詹明信批評理論文選

張旭東編

陳清僑等譯

© 牛津大學出版社 1996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ISBN 0 19 586482 4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without the prior permission in writing of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td. Within Hong Kong, exceptions are allowed in respect of any fair dealing for the purpose of research or private study, or criticism or review, as permitted under the Copyright Ordinance currently in force. Enquiries concerning reproduction outside these terms and in other countries should be sent to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td. at the address below

This book is sold subject to the condition that it shall not, by way of trade or otherwise, be lent, re-sold, hired out or otherwise circulated without the publisher's prior consent in any form of binding or cover other than that in which it is published and without a similar condition including this condition being imposed on the subsequent purchaser

版權所有·本書任何部分若未經版權持
有人允許·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襲或翻印

Printed in Hong Kong
Published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td
18/F Warwick House, Taikoo Place, 979 King's Road, Quarry Bay, Hong Kong

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
詹明信批評理論文選

社會與思想叢書

主編

甘 陽 芝加哥大學社會思想委員會

編輯委員

- 王紹光 耶魯大學政治學系
王漢生 北京大學社會系
周其仁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歷史學系
崔之元 麻省理工大學政治學系
陳 來 北京大學哲學系
吳 欽 科技與發展·中國發展專刊
張隆溪 加州大學河濱分校文學系
劉小楓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社會與思想叢書緣起

歷史悠久的牛津大學出版社從一九九二年起開始出版中文書籍。這或許預示着：中文這一為十多億人所使用的語言文字，在世界文化和學術的發展中將會日益取得其應有的地位。現在，牛津大學出版社又決定出版「社會與思想叢書」，俾更有系統地積累有價值的中文學術著述和譯述，我們希望，這對於中國學術文化的發展，將會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

「社會與思想叢書」將首先着重於對中國本土社會與本土思想的經驗研究和理論分析。誠如人們今天已普遍意識到的，晚近十餘年來中國所發生的深刻變革，並非僅僅只是相對於一九四九年以來甚至一九一一年以來而言的變遷，而是意味着：自秦漢以來既已定型的古老農業中國，已經真正開始了其創造性自我轉化的進程。這一歷史巨變已經將一系列重大問題提到了中外學者的眼前，例如，鄉土中國的這一轉化將會為華夏民族帶來甚麼樣的新的基層生活共同體？甚麼樣的日常生活結構？甚麼樣的文化表達和交往形式？甚麼樣的政治組織方式和社會經濟網絡？所有這些都歷史性地構成了「中國現代性」的基本課題，同時恰恰也就提供了「中國傳統性」再獲新生的歷史契機。可以說，當代中國的這一歷史變革已經為中國當代學術文化的突破性發展提供了充分的歷史可能與堅定的經驗基礎，因為它一方面使人們已能立足於今日的經驗去思考中國的未來，同時也為人們提供了全新的視野去再度重新認識中國的歷史、中國的文明、中國的傳統性。有鑒於此，本叢書將不僅強調對當代中國的研究，同時亦重視對中國歷史的研究，以張大「中國現代性」的歷史文化資源。

「社會與思想叢書」的另一方面則是同時注重對西方社會與思想，以及其它非西方社會與思想的研究。如果說，晚近十餘年來的中國變革標誌着「中國現代性」的真正歷史出場，那麼，七十年代以來西方最引人注目的現象無疑莫過於對「西方現代性」歷史形成的全面重新檢討：在經濟領域，所謂「福特式大生產方式」的危機不僅促發對「後福特時代生產」的思考，而且首先迫使人們重新檢討「福特式生產」的歷史成因及內在闕失；在政治領域，西方現存體制與民權運動以來民主發展的尖銳張力，已重新激發西方近代以來「自由主義 v.s. 共和主義 (Republicanism)」這一基本辯論；在文化領域，形形色色的後現代主義不但已全面動搖近代西方苦心營構的文化秩序和價值等級，而且更進而對「西方傳統性」本身發起了全面的批判。所有這些都提醒人們：自上世紀末以來一直在學習西方的中國人，今天已不能不同樣全面重新檢討中國人以往對西方的理解和認識。因此，本叢書將不僅包括對當代西方的研究，而且更強調對西方歷史傳統的重新認識，特別是西方傳統內在差異性的研究。

本叢書定名為「社會與思想」，自然表達了一種期望，即：對社會制度層面的研究與對思想意識層面的研究，應該日益結合而不是互不相干。從學科的角度講，亦即希望社會科學領域的研究與人文及哲學領域的研究，能夠相互滲透，相互促進。通過多學科的合作與跨學科的研究去深入認識中西現代性與中西傳統性，以往那種僵硬的「傳統 v.s. 現代」、「中國 v.s. 西方」的二元對立思維方式或將會真正打破，代之而起的是人類對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的同等尊重和相互理解。中文學術世界為此任重道遠！

甘 陽

一九九三年十月

編者序言

詹明信 (Fredric Jameson) 對於中文世界的讀者來說早已不是一個陌生的名字。在老一輩西方馬克思主義者 (如阿爾都塞、薩特、威廉斯等) 相繼謝世的今天，詹氏幾乎已成為西方 (特別是英語世界裏) 一枝獨秀的馬克思主義文化批評家。作為當代為數不多的在跨學科、跨地域範圍裏具有廣泛影響的理論風雲人物，詹氏深深捲入了自後結構主義興起以來西方理論界的一系列論爭，並在某些極具爭論性和開創性的理論領域留下了自己鮮明的印記。

詹氏在兩個在許多人看來相互排斥的問題領域奠定了自己的理論地位，並徹底改變了人們探討這些問題的思路。一方面，他是「後現代主義」的主要理論家、分析家和病理診斷師；另一方面，他又是八十年代以降馬克思主義批評理論的最富活力、最雄心勃勃、最多產和系統的實踐者。

在「共產主義」和許多人心目中的馬克思主義全面退潮的「冷戰後」時代，詹明信的理論立場和政治立場一如他的知識產量一般毫無低迷的氣象。在自由市場的意識形態又一次宣布歷史已經終結的今天，詹氏獨具慧眼地指出，馬克思主義與它唯一的研究和批判對象——資本主義——道重新獲得了空前的問題性、活力和重要性。在專業化、體制化、理性和商業化似乎杜絕了一切有關未來的想像的消費主義時代，詹氏把尋找歷史的無窮變化和複雜矛盾，探索文化本文同廣闊的社會經濟境

遇的有機關聯定義為自己批評旨趣的核心。正如他在編者為本書所做的專訪中指出的，晚期資本主義這個龐然大物本身同時構成了當代社會經驗和理論敘事的連貫性和不連貫性，構成了他的批判思維的「構成原則」(organizing principle)。

置身於美國學術界這部龐大的文化生產機器中，作為「晚期資本主義」文化的核心即美國文化的「本土」批評家（儘管以美國學術界的口味，這位薩特和阿多諾的門徒簡直是個不可救藥地「歐洲中心論」者），詹氏的批評活動一方面具有與文化工業及其意識形態針鋒相對的顛覆性和批判性，另一方面也在具體的政治經濟學意義上從自己的批判對象身上獲取了種種物質的或象徵性的力量。把自己的課題鎖定於「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詹氏的寫作獲得了為許多西方學院理論家無法企及的廣闊視野和強大動力。如果十九世紀的寓言精靈只是在游蕩於巴黎商業街道時夢想到了商品的疆域，那麼對於後現代歷史階段的辯證論者，資本和資本的符號所及之處，一切都變成了寓言。

詹氏這一理論上的戰略姿態只有通過長期的艱苦的理論實踐和批評實踐才成其為可能。然而詹明信並不自以理論家自居，而是強調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並認為這是馬克思主義與精神之所在。無疑理論建設本身在詹明信著作中佔有相當的地位，但在他看來，理論的更為深刻的含義不在於其自成體系，而在於它所揭示、所敘述的問題。詹明信的讀者往往忽視了一點：他那似乎是無所不包的「總體論」或「大敘事」並不是一個理論運作的框架，而是一種歷史信念和烏托邦理想的指涉系統。在具體的理論分析過程中，詹氏的原則決不是任何本質主義的決定論或高高在上的邏輯演繹，而恰恰是具體的分析、兼容並包的歸納和流動不居的「中介」努力。如果辯證法是詹明

信的敘事原則，那麼這種辯證法既不是一種哲學體系也不是一種方法體系。正如他在訪談中明確指出的，辯證法不是一種一勞永逸的、來自主觀的原則，而是人與環境和歷史的永恆變化之間的近於絕望的搏鬥。在這場鬥爭中，人們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與自己的主觀性決裂而去接受嚴酷的現實法則，但一次又一次地被來自主觀和環境的假象所包圍而回到這場鬥爭的起點，在此，真理是一個稍縱即逝的瞬間，為了在這個瞬間找到一個講述歷史變化和現實矛盾的敘事，人們不得不永無休止地向時間的激流、矛盾的不可窮盡的複雜性以及種種意識形態的蒙昧發起攻擊。詹明信相信，能夠傳達這一真理過程的不是哲學，而是一場永無止境的文學實驗，是基於「再現的不可能性的再現的努力」。

從這種批評的旨趣出發，理論本身必須還其本來面目。它必須被視為特定環境的產物。而在晚期資本主義時代，任何理論敘事所隱含的「總體性」只能建立在現實和文化本文的破碎性之中。這對目前流行的種種理論迷信，無疑是一劑良藥。

不斷歷史化的前提自然而然地引伸出詹明信對不同的社會、經濟、歷史、政治、文化語境及其差異性的高度重視。正是基於對這種差異性的強調，基於對環境的具體性的重視，詹明信對自己理論活動的特殊性和局限性有着清晰的認識。這種認識不但使他對美國知識分子提出了種種尖銳的批評和熱切的要求，也使他對第三世界國家的社會事業和文化事業充滿純正而誠摯的期待和同情。作為一個專業訓練同中國毫無關係的學者和批評家，他對中國文學和中國社會所抱有的近於狂熱的興趣和信念是所有詹明信的中文讀者有目共睹的。他不但對魯迅、老舍、毛澤東這些現代中國的文學和思想巨匠有着熟稔的了解，對台灣新浪潮電影和香港通俗文化亦有極深的興趣。

編者序言

自詹明信一九八五年訪問中國大陸，並在北京大學進行了長達一學期的系列講演以來，中文世界陸續翻譯了不少詹氏的文章，其中相當部分是理論上的重頭戲。在詹氏的代表著作仍缺乏系統的中譯本的情況下，將這些文章匯集出版，或許有助於中文讀者一窺詹氏批評活動的時空跨度和理論特徵。在中國文化圈（包括港、台、大陸）日益暴露在以美國為首的後現代主義文化工業及其意識形態的強大火力之下的今天，詹明信的理論思辨和批評攻勢也許新添了十年前大陸「文化熱」期間仍不具備的一層現實意義。

由於參予人員的分散和各自情況的變化，此書的翻譯和編輯工作歷時三年，最終仍在匆忙中結稿殺青。許多文字體例上的不盡人意之處，在所難免。作為編者，我想在此感謝諸位譯者的支持和理解。這個譯本的功勞應歸於他們。感謝美國杜克大學出版社，明尼蘇達大學出版社等機構慷慨授予詹氏文章中文版的版權。特別感謝詹明信教授本人，在繁忙的教學、寫作和學術活動日程中抽出一整天為中文版的出版接受編者的長篇採訪。這個近三萬字的訪談錄是一把打開詹氏思想世界的鑰匙，也是一個極好的進入當代理論問題論爭的導引。

最後要感謝牛津大學出版社編輯。整個文集的構思、醞釀、集稿和發排，每一個步驟都包含着他的心血、智慧和令人嘆服的專業效率。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本書的編者是我們兩人，而不是我自己一人。在此書的編輯過程中，我的摯友，牛津出版社「社會與思想叢書」主編甘陽先生一直給予熱情的鼓勵和關注，在此一併致以深深的謝意。

張旭東 一九九六年一月、新澤西

馬克思主義與理論的歷史性

詹明信就本文集出版接受採訪

· 理論的歷史性

張旭東：我的第一個問題是關於您個人「理論語言」的全貌以及您「方法論」的構成。一般人看來，您結合了馬克思主義與廣義的結構主義——後結構主義，繼而創造了一種兼容並包的批評風格。您能否談談當代「理論」發展中不同取向相互滲透的過程，以及這種滲透在您本人工作中的表現？

詹明信：這裏有幾樁事情需要交待一下。首先，我們所泛稱的「後結構主義」不是一個精確的概念，而是包含了從語言學到精神分析的一系列內容。它是一個歷史概念，而作為一個歷史概念，它又是從馬克思主義的問題性中生發出來的。我說的不是馬克思主義本身，而是馬克思主義所致力探討和解決的問題。以法國情形為例，二戰後主導法國思想界的當然是存在主義。但它很快變成了馬克思主義的存在主義。而結構主義的問題性正是在此刻開始凸現的。我所指的不是結構主義本身的立場，比如語言是人類意識活動的最終決定因素之類，而是它所探討的語言在社會文化生活中的作用和位置。這一問題是從馬克思主義的框架中生發出來的。戰後，馬克思主義在尋求一種更為貼切精微的關於文化和意識形態的概念。而所有具體的後結構主義題旨都來自對於這一問題的探討。

*1995年12月31日、於芝加哥美國現代語言協會年會。

還要補充一點：我近來還對另一種重要的影響來源深感興趣。這便是布萊希特的影響。布萊希特在四四、四五年間在柏林布萊希特劇院的出現是一個重大事件。儘管人們一般並不把布萊希特視為哲學家或理論家，但他的辯證思想卻為日後的後結構主義明確了任務，這就是反人道主義。在布萊希特的作品裏人們可以看到對兩種事物的猛烈攻擊。一是對經典資產階級傳統的攻擊（而盧卡契則為這一傳統辯護）；一是對所謂的社會主義人道主義的攻擊（盧卡契顯然又是這一觀念的倡導者）。這種反人道主義在阿爾都塞等人手中得到進一步發揮。阿爾都塞寫過關於布萊希特的文章，兩者間的聯繫是清楚的。人們也都知道一些問題是由布萊希特提出的。

我所要強調的是，人們當然可以脫離歷史而談後結構主義文本本身的價值，但如果你想更大的語境中弄清楚問題的來龍去脈，你就得注意馬克思主義的框架。在戰後法國，百分之八十以上知識分子自認為馬克思主義者，至少是認為馬克思主義的問題——基礎和上層建築的問題、意識形態的本質的問題，表象的問題，等等——是他們各自議題中的基本因素。

這也可以說明另一個讓某些人感到吃驚的現象，即德里達為何要介入馬克思主義的主題。一兩年前我們都看到了德里達談馬克思的書（按：指德里達的《馬克思的幽靈》，英譯本題為 *The Spectres of Marx*）。我認為原因是在法國知識界非馬克思主義化以後——現在只有不到百分之二十的人自視為馬克思主義者——大理論家更為明確地意識到他們自己的工作是如何建立在馬克思主義問題性（再強調一次：不是馬克思主義本身）之上的。德勒茲的情形亦是如此，儘管不幸的是德勒茲生前未能寫成他的論馬克思的巨著。此外還有許多其他人。德里達的補救工作帶有一種多重性：一方面他評論馬克思的著作；

另一方面他又要介入一個目前已沒有激進派選擇餘地的政治環境。再者，他也在試圖歷史地拯救馬克思主義的基礎。他本人的思想也是以一種奇特的方式從這一基礎發展出來的。這一切把他和馬克思主義聯繫在一起。

至於你的問題在當前理論界的具體反映，我想這同「理論」的本質有關。理論出現於偉大哲學體系的終結點，出現於一種市場環境。在這種環境中，理論總不免要變成不同的理論商標。如果有人覺得這麼說太不恭敬，那麼我們可以說理論往往以多種「名牌理論」、「個人習語」或「私人語言」的方式存在。哲學體系的特點是將現實中形形色色的觀念統統吃進，再賦予其一種單一而自成一體的語言、概念和術語系統。在這個意義上，哲學的終結意味着沒有人再認為這是可能的了。這也就是說，我們不得不同時操起各式各樣的理論語言。我們找不出什麼將這些語言綜合在一起而變成一種萬能語言（master language）的辦法，而我們甚至連這樣做的慾望也沒有，這就造成了你問題中所暗指的局面：一個人現在用的是馬克思主義語言，可是一轉眼又說雅各布森的語言，或列維—斯特勞斯的語言，或拉康語言。人們常常指責我在這一點上搞折衷主義，但我覺得我們還是應該在語言上着眼。這就好像有些事情只有用法語說才清晰有力，有些事情只有德語才講得明白，到了法語裏就一塌糊塗，而又有有些事就非用中文不行。理想狀態應該是隨你所討論的問題而從一種語言跳到另一種語言，但這幾近於不可能。從這一角度看，我也認為馬克思主義同某些後結構主義理論的關聯極為密切，儘管這種關係並非一眼就可以看破。

討論這類問題必須重構具體的歷史環境，否則很難有令人滿意的答案。我希望在我說明這些複雜問題的同時，這些說明

也可以用來引導我們進入一些更為基本的理論、哲學問題。但我必須標出各式各樣的名字，否則就像是我把這些觀念都算在了自己的份上。事實的情形並非如此。毫無疑問在這些哲學指涉的鏡像中，不了解原始材料就會量頭轉向。

張旭東：人們通常覺得您一半是「法國」的，一半是「德國」的——前者指後結構主義，後者指法蘭克福學派。現在您告訴我們這個「法國」並非只是同「辯證批判」相對立的種種語言學、符號學和「理論」，而首先是馬克思主義問題性的一部分。

詹明信：對，是這樣的。我在學生時代就可以說流利的法語和德語，並接觸到法、德兩種學術思想傳統。但這純屬個人背景上的偶然因素。人們往往習慣於在法、德兩種傳統間選擇，或揚「法」抑「德」，或揚「德」抑「法」。我一方面覺得這種做法可以理解，另一方面也覺得它非常古怪而可悲。前面已經說過，我並不認為嚴絲合縫的綜合可行。同時我也不覺得借用來借用去是個成功的辦法。以阿多諾在法國七十年代的借用為例，人們當時把「反同一性」的阿多諾列在後結構主義的名下來反對馬克思主義。在我看來，這是對阿多諾思想的歪曲。此類結合並不如意。如何在不同立場間對話實在是一件很複雜的事情。人們不妨回憶哈貝馬斯與福柯的對話，或喬姆斯基與福柯的對話。除了在一些基本的政治、文化問題上，在這些語言間對話幾乎是不可能的。我相信德、法傳統兩者都是偉大的哲學—理論傳統，在這個意義上我或許可以算一個歐洲中心論者。我的思想只是碰巧形成於這樣一種氛圍。因而英美思想——經驗主義、日常語言哲學、維特根斯坦，諸如此類——

對我來說多多少少是一種障礙，用保羅·德曼的話，是「對理論的抗拒」。所以、客觀的講，我對這些東西並不熱衷。我認為自皮爾斯以來在英美傳統中有極為有趣的東西，但我的基本理論框架仍然是來自德法的

張旭東：這裏我想打斷一下。我相信把您當前的理論框架放在歷史語境裏談會對讀者有所裨益。但在西方理論中心之外，人們仍傾向於用一種更為粗疏的意識形態眼光來看問題，把多種立場按激進主義、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的分野來安排。您能不能談談西方馬克思主義同戰後自由主義思想或立場的關係？

詹明信：戰後西方的自由主義立場在很大程度上是為反共和反馬克思主義所界定的。在這一點上，蘇聯式的共產主義本身是什麼並不是很重要。因此、對於西方左派來說，自由主義從來都是信譽掃地的。不過目前出現了形形色色的自由主義的回潮。它們身上的污點相對較少，因為至少它們不用在口頭上口口聲聲反共了，無論它們在更深一層的政治信仰上有什麼變化。但很清楚的是，我們（按：指西方新左翼）從來不指望自由主義能提供任何激發思想的東西、因為它本質上是一種冷戰自由主義、只不過在哲學上塗上了英美哲學的色彩。

張旭東：我想您理解問這個問題時我們關心的並非馬克思主義理論與自由主義理論的結構性關聯，而是人們樂於從激進—自由—保守的立場分歧看問題的舊習。

詹明信：我完全理解。這是生存策略，人人都會這麼做。但我認為最好還是從哲學問題本身開始，然後，或者說最後，再來決定這些問題是出於激進主義立場，還是自由主義立場或保